

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十五）

李 致 忠

《尔雅疏》十卷 宋邢昺等撰，宋刻宋元明初递修公文纸印本 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每版字数，下记刻工姓名，中镌“雅疏”及叶码。

邢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生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卒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享年七十九岁。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累官至礼部尚书。《宋史·儒林传·邢昺传》，记载邢昺“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昺以是监处楚、秦间，秦僻左而楚会要，盐食为急，请改隶楚州。从之。明年，召为国子监丞，专讲学之任。迁尚书博士，出知仪州，就转国子博士。代还，赐绯，选为诸王府侍讲。雍熙中，迁水部员外郎，改司勋。端拱初，赐金紫，累迁金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司勋郎中。俄知审刑院，以昺儒者不达刑章，命刘元吉同领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陈夙侍讲讽，迁右谏议大夫。咸平初，改国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及成，并加阶勋。”这就是说，邢昺等奉敕撰定《尔雅》义疏等经书，

是在他出任国子祭酒、坐讲《春秋》于殿上的咸平初年。这时邢昺年届六十七、八岁，学问淹洽，经术淳深，正是领衔疏经的权威时代。

《玉海》卷四十三“咸平校定七经疏义”条，记载“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定《周礼》、《仪礼》、“公”、“谷”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余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于是九经备矣。”这表明邢昺领衔校定义疏《尔雅》等七经，始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三月，次年九月，也就是一年半以后便全部完成表进，至十月九日已下令版印颁行。其效率之高，叹为观止。

《尔雅疏》卷首有邢昺序，于疏义该书缘起、经过、所宗、去取等，表述甚明。“夫《尔雅》者，先儒援教之术，后进索隐之方，诚传注之滥觞，为经籍之枢要者也。……其为注者，则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虽各名家，犹未详备。惟东晋郭景纯，用心几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琬，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今既奉敕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铨，则以景纯为主。虽复研精覃思，尚虑学浅意疏。谨与尚书驾部员外郎直秘阁臣杜镐、尚书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臣李维、诸王府侍讲太常博士兼国子监直讲臣孙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臣王焕、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臣崔偓佺、前知洛州永年县事臣刘士玄等，共相对之讨论疏释，凡一十卷。虽上遵睿旨，共竭于颛蒙，而下示将来，尚慙于疏略。”这篇序文，迄今仍是《尔雅疏》最详实的编纂说明。此文以降，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

《直斋书录解题》，于邢昺《尔雅疏》虽然均有著录，但都摘抄此序，串通表述，无出新意。所以有这篇序文，再加上前引《玉海》中的记载，关于《尔雅疏》的编纂缘起及成书过程便跃然纸上了。

《尔雅疏》的最早刻本，当是咸平四年（1001）的刻本。前引《玉海》咸平四年“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于是九经疏义备矣”可证。从咸平四年至北宋灭亡，尚有一百二十七年的历史。这中间官刻私雕，当赓续未断。靖康之变，金人破汴，书籍及书籍版片，被金人捆载北还，亦可谓书之一厄。高宗南渡，移都杭州，国事初定，便又借重经籍。故于“绍兴九年九月七日，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原颁善本，校对镂版。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版者，令临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史旧监本刻版。……由是经籍复全。”（见《玉海》卷四三）可见包括《尔雅疏》在内的群经义疏，至南宋初年又经全面刊行。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的宋刊本，则是较这些版本刻要早的一种。

民国七年（1918），傅增湘于乌程蒋孟蘋密韵楼观书，记载“《尔雅疏》十卷，宋邢昺撰，宋刊本。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用洪武时官文书纸印。七卷第八叶至卷末为补刊。钤有‘文渊阁印’、‘汪闾源印’、‘鱣读’、‘泰州刘麓樵购于扬州癸丑兵火之后’”。

民国九年（1920）四月，傅增湘又阅书于宝应刘翰臣家，又记载“《尔雅疏》十卷，宋邢昺撰。存卷五至卷七，计三卷。宋刊本。十五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鱼尾下记‘雅疏’二字。与蒋孟蘋藏本同。”

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傅增湘东渡日本，阅静嘉堂文库藏书，又记载“《尔雅疏》十卷，宋邢昺撰，宋刊宋元明递修本。半叶十五行，每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

数，下记刊工姓名。按陸心源氏题跋云，此书旧有二本，一为士礼居所藏，一为五砚楼所藏。中经兵乱，世间未必有二，且未知此帙为谁氏所藏。然以余所见，密韵楼蒋氏藏有一帙，为士礼居旧物，则陸氏所得尝为袁氏本也。蒋氏本是洪武时官纸印，此本为元至顺时官纸印，其印本亦差相类，疑同时所印行也。余更别见一本于江北旧家（谨按：即宝应刘启瑞翰臣），是世间固有三本矣。且卷中补版正多，当是元修明印。陸氏谓咸平祖本，非其实也。”（以上三段均见《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是当代藏书大家，见多识广，版本学功力极深。他在十一年中（1918——1929）见过三部宋刻《尔雅疏》。一部见于乌程密韵楼，一部见于宝应刘启瑞家，一部见于日本静嘉堂。密韵楼是蒋汝藻的藏书楼。蒋氏所藏即明代文渊阁旧物，后迭经陈鱣、汪士钟、刘麓樵等收藏，又归于蒋氏密韵楼，再归涵芬楼，最后归入北京图书馆。另一部残帙，仅存卷五至卷七三卷，与上述一部为相同版本，今不明下落。再一部是清代吴县袁廷桢五砚楼旧藏，后归归安陸心源皕宋楼，后卖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亦与上述两部为相同版本。北京图书馆所藏与日本静嘉堂所藏，均用过时之公牍档册纸背印造，因疑这两部非但同版，盖刷印亦同时也。这个版本，陸心源谓是咸平祖本，即咸平四年十月九日诏刻颁行的版本，恐怕是有意抬高自己藏书的身价，而绝非事实。

检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开篇首行顶格镌“尔雅疏叙”；二行低二格镌“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事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邢昺等奉”；三行低二格镌“勅校定”。钐有“文渊阁印”、“陈鱣收藏”、“鱣读”、“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仲鱼藏书”、“汪印士钟”、“闾源真赏”、“泰州刘麓樵得于扬州癸丑兵火之后”、“宋本”、“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等印记。开卷版式虽同，但各版字体，甚至一版当中，字体风格都很不一致，这说的确是个递修本。有的版面，字体浑

朴厚重，颇有古风，一看便知是原刊字迹。但这原刊究竟开版于何时，尚须一番考证。

陸心源氏谓其所藏《尔雅疏》为咸平祖本，则持据不足。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称：“是本宋讳玄、敬、弘、殷、匡、胤、恒、禎等字，多缺末笔；钦宗、高宗嫌名萱、媿二字及孝宗讳慎字，亦偶或一避。”这里的“玄、敬、弘、殷、匡、胤”等字，都是回避宋太祖赵匡胤及其父、祖、远祖的名讳，这是宋版书，包括南宋刻书避讳的通例，于考定版刻时代无足为凭。然恒字缺笔，是回避宋真宗赵恒的名讳；禎字缺笔是回避宋仁宗赵禎的名讳。咸平是宋真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若《尔雅疏》真是咸平初刻，则其避讳当仅至恒字而已。而禎字一缺笔避讳，则表明其刻已晚于宋真宗临御二十四年的时代了。因为禎字已是宋仁宗的御名了。可见陸心源说他所藏的《尔雅疏》是咸平祖本，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陸本与今日北图所度之本是相同版本，因而北图之本亦不可能是咸平初本。

此本避讳极不严谨，如卷一“老人寿徵也”，徵不缺笔；“《诗》曰慎尔优游”，慎不缺笔；“绍胤嗣续”，胤缺末笔。卷二“病之状玄黄者”，玄不缺笔；“惟虑愿念靖慎思也”慎不缺笔；“寅燠敬也”、“小心之敬也”，两个敬字均未笔；“遘逢遇也”、“亦既遘止”，遘均不缺笔；“《诗》曰慎尔出话者”，慎不缺笔。卷三“取上所以敬录接下”，敬不缺笔；“下所以敬录事上”，敬不缺末笔；“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沟，沟上有畛”，两沟字均不缺笔；“斤斤重慎之察也”，慎不缺笔；“郑玄云”，玄缺末笔；“《小雅》正月云忧心慙慙”、“毛传云慙慙然痛也”，慙均不缺笔；“慙慙惇惇”，两殷字均缺末笔。卷四“《广雅》云孙顺也，许慎云从子从系”慎字缺末笔；“玄孙”，玄缺末笔；“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两慎字均缺末笔。卷五“许慎云楚谓之聿”，慎又不缺笔。这种讳字时避时不避的

现象，书中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可能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种是补版递修所造成；一种是坊肆民间刊版避讳不严所造成。版经递修，每次递修都在一定的时间里进行，因此就会产生不同的讳字。且原版补板刻非同时，原版不避的字，补版时可能正行回避；反之，原版避讳的字，到补版时可能时过境迁，或讳例已松，或已无须回避。所以一书中同一字时避时不避，当是修补本或递修本的固有现象。《尔雅疏》讳字混乱，正是其几经递修的产物。宋代官刻经书，其行款版式虽无一定程式，但每半叶十五行款版式者尚属闻所未闻。而民间坊肆刻书就要看财力大小和利润高低了，所以常有狭行细字的版式出现。且于避讳掌握不严，想起来就避，想不起来就不避的现象时有发生。《尔雅疏》避讳混乱，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所以《尔雅疏》的这种混乱的避讳现象，反转过来也可说明此本很可能是民间坊肆所刻，且几经修补。

此本版心下方所记刊工姓名，不少模糊难辨。可辨者有王恭、毛端、吴津、陈浩、方中呈、李仲、刘廷、张明、徐友山、张忠、俞声、陈邦卿、徐荣、李祥诸人。考王恭，是南宋中期杭州地区的名工。他参与过绍兴间吴兴刊本《唐书》的补版工作，又参与过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周礼疏》的补版工作。又参与过严州本《钜鹿东观集》、《新刊剑南诗稿》的镌版工作。可见他是一位以杭州为阵地，而又活跃在越州、严州一带的良工。毛端是南宋初、中叶杭州地区的良工，他参与过绍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周易注疏》的刊版工作，又参与过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本《礼记正义》的镌版工作。可见他也是以杭州为阵地而活跃在浙东一带的良工。李祥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参与刻过《备急总效方》的镌版工作。又参与刻过杭州本《说文解字》。又参与过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刊八行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工作。可见他也是南宋初、中叶活跃在浙东的刻工。

陈浩可能是北宋末南宋初期的刻工，他参与过北宋刊递修本《史记》的镌版工作，而且是原版刻工。还参与过北宋本《汉书》的镌版工作。其余如吴津、李仲、陈邦卿等，可能是南宋末至元朝初年的刻工。俞声则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他参与过南宋绍熙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本《礼记正义》的修版工作，参与过元大德间杭州路刊河西字（西夏文）《梁皇宝懺》的镌版工作。这样一批刻工又出现在《尔雅疏》上，就充分证明《尔雅疏》的的确确是个递修本。而且在南宋恐怕就不只修过一次。这些，我们从版面风格和不同时代的刻工同出一书的现象上，已经比较容易地解决了。问题是此书原刊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在现存宋版书中，讳字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对北狩的北宋末帝钦宗赵桓之嫌名，避讳尤严，涉及与“桓”有关的字，亦回避甚严。可此书卷九：“释曰舍人云鱣一名鲩”，鲩字不缺笔；“鲩，注今鲟鱼，似鱣而大”，鲩字也不缺笔。这表明对钦宗名讳未行回避，其刻是否还在钦宗之前，亦未可知。

《涵芬楼烬馀书录》谓“群经之疏，初均单行……。今存者唯知临清徐氏有《周易正义》，前吴门黄氏有《仪礼疏》及日本图书寮有《尚书正义》，内藤氏有残本《毛诗正义》，又身延山久远寺有《礼记正义》数卷而已。《易疏》今归余友傅沅叔，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尚书》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四字。《毛诗》十五行，行二十二、三、四五字。《仪礼》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是本（指《尔雅疏》）每行字数二十九至三十一不等，视他本为多，而半叶十五行则同，盖单疏本行数之通式也。……印纸为洪武二年公牒，多萧山、山阴二县之事，是必在杭州印造。书板非与《毛诗》、《尚书》同时开雕，即就北宋本修补也。”这里，张元济把它放在群经单疏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得出了“即就北宋本修补也”的结论。

清代阮元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在《尔雅注疏校勘记

序》中亦说：“宋槧《尔雅疏》十卷……此当脱胎北宋本。”

综合所有这些，此本《尔雅疏》似可定为北宋后期刻宋元明递修公文纸印本。

《群经音辨》七卷 宋贾昌朝撰 南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学刻宋元递修本 每半叶八行，行十五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

又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汀州宁化县学刻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四字，注文小字双行行约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

贾昌朝，字子明，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县）人。生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卒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享年六十八岁。卒谥文元。天禧初年，真宗赵恒尝祈谷南郊，昌朝献颂道左，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授晋陵主簿。赐对便殿以后，除为国子监说书。时孙奭判监，独称昌朝讲说有师法。后又为颖川郡王院伴读，再迁殿中丞。又知宜兴东明县。孙奭侍读禁中老辞时，又荐昌朝替代，召试中书，不久又复为国子监说书。嘉祐元年（1056）进封为许国公，兼侍中。寻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英宗即位，徙凤翔节度使，由右僕射加为左僕射，进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以侍中守许州，力辞，弗许。明年以疾留京师，以左僕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卒。御书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有《通纪》、《时令》、《奏议》、《文集》等。《群经音辨》则是他的代表作。

贾昌朝《群经音辨》自序谓：“臣自蒙恩先朝，承乏庠序，逮今入侍内阁凡二十年。年踰不惑，裁能涉猎五经之文，于五经之道固未有所立。尝患近世字书磨灭，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备载诸家音训。先儒之学，传授异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每讲一经，随而录之。因取天禧以来巾囊所志，编成七卷，凡五门，号《群经音

辨》。”可见《群经音辨》之成书，是逐年逐经积累，最后编纂而成的。贾昌朝天禧元年（1017）乘宋真宗御南郊祈谷之机，献颂于道左，获赐同进士出身，这年他刚好二十岁。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即贾昌朝踰不惑之年（四十岁）以后虽也做过外官，但时间很短，主要的还是供奉内廷，入侍内阁。而职业从国子监说书，到郡王院伴读，到崇政殿说书，到代孙奭侍读禁中，几乎没离开过讲解儒家经典。而讲解经书，必要辨音训字，才能申明义理。所以他自序说“每讲一经，随而录之”。四十岁之后，便取天禧以来“巾橐所志”，编纂成书，名曰《群经音辨》，凡五门七卷。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辨字同音异，依许慎《说文解字》的部目次第全文。体例则仿效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发字例。卷六为辨字音之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卷七附辨字训得失一门。书中虽仍有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但宋朝人仍认为贾昌朝总角便邃晓群经，章解句达。其《群经音辨》乃为后学著龟，使驰骋群经者解颐折角，学有指南。且针对《经典释文》散见各经，颇难检核的弱点，贾昌朝不惮繁难，“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灿然，俾学者易于寻省，不为无益。小学家至今不废，亦有以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可见《群经音辨》对读经的指导价值，历来是被公认的，故在两宋便一刻再刻，流布甚广。

此书首刻是在北宋康定二年（1041）至庆历三年（1043）之间。先是，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因翰林学士丁度等刊修《集韵》，曾经奏取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加以参考，以便使《集韵》修得更加完备。至此，他们找到并誊录了一个清本，欲送中书省看详，申请雕印。故于宝元二年十一月三日，中书门下牒知崇文院，令崇文院依据丁度等誊录的《群经音辨》清本，雕印颁行。中书省牒文虽说是如此下达了，但并未立即执行。一直拖到康定二年七月五日，才依照中书省的牒文奉圣旨开雕此书。

而开雕之后，仍是一再拖延。直至庆历三年十月，一部区区七卷头的书，却用了二年零三个月才算雕造完毕，并进呈于朝，而这时，贾昌朝不过四十五六岁，正在朝为官，平步青云。所以此本有“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轻车都尉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贰佰户赐紫金鱼袋臣贾昌朝”的衔名。又有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轻车都尉汝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肆佰户赐紫金鱼袋范仲淹；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临淄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叁仟壹佰户晏殊；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进行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京兆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五百户食实封贰仟肆佰户张得象等校勘官衔名。足见首刻此书时贾昌朝地位之显赫以及此书之影响。

此书第二次刻印是南宋绍兴九年（1139）五月，由临安府府学开雕。左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王观国为此书写的后序谓：“绍兴己未（九年）夏五月，临安府学推明上意，镂公《音辨》，敷赐方州，下逮诸邑。”可证绍兴九年临安府学的确是又刻了《群经音辨》。且此本卷尾校勘官衔名之后镌有“临安府府学今将国子监旧本重雕逐一校正即无舛误。绍兴九年五月日”题记，进一步证明临安府学于绍兴九年重刻了《群经音辨》。此本亦镌有从事郎充临安府府学教授陈之渊；左承郎添差临安府府学教授周孚先；右奉议郎权通判临安军府兼管内劝农事蒋延寿；右朝奉大夫通判临安军府兼管内劝农事赵士初；徽猷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知临安军府事充两浙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张澄等衔名，也证明临安府学确是刻过《群经音辨》。

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既无此校勘官衔名，也无后面的刻书题记，它究竟是不是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本呢？检北图所藏此书，其上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

“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证明此本曾是清朝天禄琳琅的旧物。再检《天禄琳琅书目》，其《后编》卷三著录了两部此书。其一详细著录的是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此本现亦珍藏于北图，有康定至庆历首刻此书时的校勘官衔名，有宝元二年的牒文；有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书题记及校勘官衔名；有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此书时校勘官衔名，有绍兴十二年王观国刻书后序。序称：

“文元贾魏公，总角邃晓群经，章解句达。累官国子监，誉望甚休，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其在经筵尝进所著书曰《群经音辨》，凡五门七卷，为后学著龟，有诏颁行，实康定二年十有一月也。……自胡虬翳天，神汴失守，六飞巡幸，驻蹕三吴，戎事方兴，斯文未丧。上留神经术，登用鸿儒，亲札《中庸》，班赐多士。发明奥境，表彰六经。州建学官，教覃溥率。绍兴己未夏五月，临安府学推明上意，镂公《音辨》，敷赐方州，下逮诸邑。宁化号称多士，部属临汀，新葺县庠，衿佩云集。是书初下，缮写相先。字差毫厘，动致鱼鲁。且患不能周给诸生，固请刻本藏于黉馆，以广其传。啸工东阳，阅月方就。解颐折角，驰骋群经者，自是遂得指南矣。……镂版于学，虽秀民隶业，沥恳有陈，亦长此邦者之所愿欲也。绍兴壬戌秋七月中泮月官舍西斋序。”由此可知，天禄琳琅详细著录的这一部，即是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今其上非但钤有天禄的五玺印，还钤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记，还钤有唐寅、毛晋等人印记。此本今亦藏于北京图书馆。检此书印记，与《天禄琳琅书目》所记载一一相合，亦证明此本是天禄琳琅旧物，即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

然天禄琳琅还著录有第二部，称，“《群经音辨》一函六册。同前。自序外，前牒后序俱阙佚”。这里的“同前”，就是与前边著录的那一部相同，也就是说，与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

学所刻是相同版本。“自序外，前牒后序俱阙佚”，指的是这部失掉了前边的牒文和王观国的后序，只有贾昌朝的自序尚存。今检此书，与天禄琳琅所记相合。《天禄琳琅书目》还记载阙补卷三（十七之十九）、卷四（一）、卷七（七）等叶。今检北图所藏此本亦一一相合。表明北图的这另一本，就是《天禄琳琅》著录的那第二部。然前已论证，天禄琳琅所藏的第二部，与第一部相同，亦即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首先，这两部虽然都是每半叶八行的款式，但行字就不相同了。天禄所录第一部为每半叶八行十四字的款式，第二部则是每半叶八行十三、十四、十五字不等的款式。

其次，这两部书字体风貌迥然不同。第一部字体稍瘦显长，滞而不秀。第二部字体则端庄方正，古朴厚重。两者风格迥异。

再次，卷端下题，即作者衔名，第一部占两行，第二部占一行。

再次，卷三第一部“殷，盛也。于斤切，易殷荐之上帝。殷雷声也。音隐诗，殷其雷。殷赤黑色也。于闲切，《春秋左传》轮朱殷。”所有“殷”字均缺末笔，为字不成。第二部此处除“《春秋左传》轮朱殷”的“殷”字缺末笔外，其余几个“殷”字均不缺笔。另第一部卷三“覲，见也”、“遯覲，解说也”当中的“覲”字均缺末笔，以示避讳。第二部此处是抄配叶，“覲”字不缺笔。卷四第一部“慎，牝廐也，音辰，郑众说礼五岁为慎”，两“慎”字均不缺笔。第二部此处的小注“慎”字则缺末笔，表示回避南宋孝宗讳。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天禄琳琅著录的两部《群经音辨》，本不是相同版本，可硬是著录为同一版本，实不知缘何。

幸好，这两部书现在均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使我们可以比肩相勘，知其并非相同版本。天禄琳琅所录第一部，今北京图书馆

著录为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这毫无问题。第二部，今北京图书馆著录为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宋元递修本，结论应该说是对的，但理由援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所录，谓即此本，却又不知缘何了。

前边已经指出，此书首刻始于康定二年（1041），去宋朝立国不过八十一年。宋朝讳法是极其严格的，特别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刻之书，避讳尤严。可此本讳字极其随便，表明它决不可能是康定首刻。如遇竟、敬、殷、徵、恒等字，都应该缺去末笔，以示回避。可此本竟、敬、殷等字则有避有不避，卷四“恒”字则又全行缺笔回避。这说明讳字的随意性太大，表明此本之刻决非康定原刊，而是去此已经较远。这就是说，天禄琳琅著录的第二部，既不是康定首刻，亦不是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的第三刻，可它确确实实又是宋刻，因而它最大的可能便是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本了。所以历来的各家书目、题跋，都将此本审定为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郡府学本”款下，录有“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见《天禄琳琅后编》三、彭跋、陆志、陆续跋。”。同卷“临安府本”款下，亦录有“绍兴九年刻《群经音辨》七卷。见《天禄琳琅后编》三。”今检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及其《仪顾堂续跋》，亦都详细著录此书。这些书目、题跋谓此本为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本，虽然都未提出明确证据，但这些人都是前辈通人，版本学大家，其意见亦有相当的可信程度。所以北京图书馆于1959年和1989年两次编制出版善本书目时，也都将此本著录为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本。

此本除钤有天禄琳琅的印鉴外，还钤有“吴越王孙”、“子儋”、“朱子儋印”、“竹素斋图书记”、“左庵”、“承爵”、“朱氏子儋”、“集瑞斋”、“盘石山樵”、“西舜城居士”等印记。考文徵明《朱子儋墓志铭》谓朱承爵字子儋，号舜城居

士，晚更号左庵。祖籍婺源，后徙江阴。为文古雅有思致。喜收藏，精鉴别。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卒于嘉靖六年(1527)。尝以美婢换宋槧。上述诸印记，均是朱承爵藏书印，可见此本在明朝即经各家收藏。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